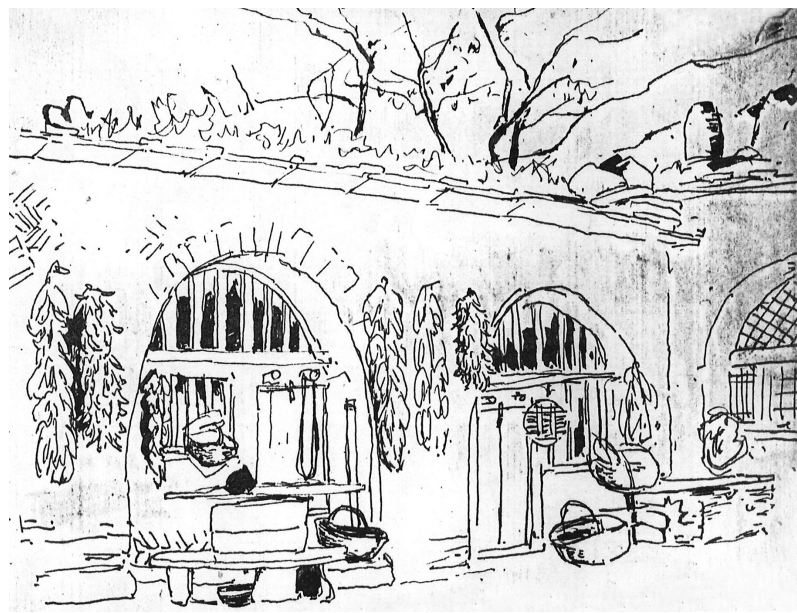




走过青春

邢仪眼中的陕北

邢仪,1951年生于北京,1969年于延川县插队。西安美术学院毕业。曾任《体育世界》美术编辑、中国体育博物馆副研究员。曾在中国美术馆和中华世纪坛举办个人油画展。出版了画集《知青·陕北速写集》、文集《追随靳之林先生写生》、图文集《我在陕北延川插队的日子》。



● 陕北的秋天最美



● 压弯了腰的谷穗



● 又矮又壮的高粱

买缸

林纪春

1969年7月,村里的8个知青分灶了。我和同学历林森两人一个灶,需要购买一口水缸。

当时,水缸是较为稀缺的东西。宜川交口供销社没货,延川稍道河供销社出售。若要买水缸,我们需要往返90里的山路。

为了买到水缸,我和历林森于七月中旬的一个五更天带着绳索、杠子上了路。天亮时,我们终于走到了延川的刘坪店村。我们用手捧着小河中的水喝了几口,吃了点干粮,稍作休息,继续赶路。终于在上午10时到了稍道河供销社。

在那里,我俩选中了一只高1米多、直

径0.5米的水缸,给服务员付了六块多钱后,用绳索捆好水缸,把木棍穿进绳索内,每人扛一头,抬缸返回。

七月,骄阳似火。我们抬着缸,顶着烈日往回赶。走着走着,突然天色昏暗。紧接着,电闪雷鸣,豆大的雨点从天而降。我俩就把缸扔在一边,跑进一孔废弃避雨。

两小时后,雨过天晴,天边架起一道彩虹。当时离村还有20里山路要走,为了天黑前进村,我们扛着缸,顺着泥泞的山路一步一滑地前进。前进过程中,我们一只手扶着缸沿,另一只手扶着身边的崖壁向前蹭。

天黑前,我们终于赶到了董家圪塔

村。从这个村到我们居住的贺家川的路都是上坡路。于是,我先手脚并用地上坡,用绳子把水缸往上拉,历林森也在后边往前推着水缸。眼看就要到平地了,可历林森脚底一滑,我一个人拽不住缸,便也跟着往下滑。这一过程中,我刚开始怕砸到下面的同学,便拽着水缸不松手;后来害怕水缸的惯性把我带到左侧的山崖下。最后,我瞅准一个既不伤害同学也不伤害自己的时机,忍痛割爱,松开了水缸的绳头。

费尽千辛万苦,跋山涉水抬回的水缸,最终还是落到了沟底,只换回一声沉闷的响。

那盏小煤油灯

李连科

1969年1月21日,我到达了陕北农村,开始了我的插队生涯。

在陕北窑洞里住的第一个夜晚,是我18年来第一次过的一个没有电灯的夜晚。

当时,整个县城都没有电,我插队的农村更不必说。我和其他知青只有靠点煤油灯度过一个又一个漆黑的夜晚。

而我们点的煤油灯,是用一个墨水瓶做的。墨水瓶里倒满了煤油,一根棉花搓的灯芯浸泡在瓶里的煤油中。每到夜晚,我们用火柴将露在墨水瓶嘴外边的灯芯点燃,用以照亮。

夜晚,窑洞里虽然点着煤油灯,可一米开外什么也看不见。灯随着人的走来走去,那点亮忽大忽小。人的头映在墙壁上,

如同《聊斋志异》里的人物。煤油灯的烟很大,第二天醒来,我们的鼻孔都是黑黑的。

此后,煤油灯伴随了我们很长一段时间,我们也慢慢习惯了。

后来,我们去县城供销社买了盏煤油灯,这盏煤油灯点着后,比起自制的煤油灯亮堂多了。

就这样,我们不知在煤油灯下度过了多少个夜晚。

我们在煤油灯下给家里写信,向家里汇报我们插队的情况。在信中,我们报喜不报忧,写我们在生产队的所见所闻,写我们劳动生产的情况,当然更多的是写思念亲人的话。每一封家书都是沉甸甸的,寄托了我们所有的情思!当然,煤油灯也在

我们的汇报之列。

爸爸妈妈回信时,总忘不了叮嘱我们使用煤油灯时注意防火。大人们总是比我们想得更多。

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70年的9月。那时候,我进了工厂,而且还是发电厂。那时候,延安电网已经连成片,很多延安的老百姓再也不用为过漆黑的夜晚而发愁了!我们全县人民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没有电的历史也终于结束。

可千万别小看一盏小煤油灯,毛主席当年就是在延安的煤油灯下写出了《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等鸿篇巨著,指导着中国人民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小煤油灯绝对功不可没!

艰难回家路

谢云兰

1969年1月,上山下乡的大潮把我们五个女生分在了官庄公社那只有七户人家的高家河小队插队落户,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秋天,各种农作物都收割完了,全部装进了各家各户的囤里,往日忙忙碌碌的小山村安静了下来。清晨,也听不到队长在硷畔上扯着嗓子喊到哪块地除草、到哪块地割麦了,生活也显得悠闲自在。这时候,我们知青就想到了回家。

我们队最初有五名女生,其中,中途回北京了一名,转插河北一名。所以,村里的北京知青就只剩下我、王玉茹、王洪三人了。

一天,在条子塬插队的我的同学张京枝来找我们结伴回家。可当时,有消息传出来,说陕西省禁止知青年前回家,为的是让知青在农村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各车站接到了通知,都不给知青卖车票。但听说山西省无此禁令,知青们可以自由往来。

当时我们正年轻,精力旺盛。于是决定四人结伴徒步过黄河,到山西境内再乘火车回家。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当我们确定好徒步去山西的路线,就做起了准备工作:发了一盆玉米面,蒸了一锅玉米面馍,准备带着路上吃;把洗漱用具和玉米面馍装进挎包,又从箱子底层拿出一一直没舍得花的十几元,用针线缝在棉袄兜里。

1969年11月19日早上,我们四个人穿着棉大衣,围着围巾,背上挎包到队长家请假。队长嘱咐我们:“顺着大路走,天黑了就找地方住下,不行就回来……”说得我们眼泪汪汪的,使劲点头。

我们顺着羊肠小道走了五里路才到了公路上,然后挨着汾河边一直往东走。中午,我们走到了云岩集市,看到一个卖茶水的小摊,两分钱一大碗茶水。我们每人买了一碗茶水,把挎包里的干粮拿出来,就着茶水吃了,继续往前走。

冬季的天黑得早,下午五六点钟,天色就慢慢沉了下来。我们看到路边有个小客栈,就住了下来。老板先给我们打了一盆1毛钱的洗脸水,我们洗完脸后,看到墙上的一块黑板上写着:回锅肉5角一份,土豆丝1角一份,杂面馍5分一个。我们要了一盘土豆丝和10个杂面馍,边吃饭边和老板攀谈:从这到山西怎么走啊?老板说要走到韩城过一座铁索桥就是山西地界。我们听后,倒吸一口气。不约而同地说:“那么远啊?都想打道回府了。”11月20日早上,我们边吃早饭边商量,最后还是决定前行。就买了几个杂面馍带着,告别客栈老板,又踏上了征程。

我们沿着黄河边默默走着,忽然看到一个老汉正在和一位穿着打扮像知青的

小伙子交谈,他们的脚下放着一只羊皮筏子。过了一会儿,那个老汉把羊皮筏子推到黄河岸边,那位小伙子上了羊皮筏子。老汉回头看见了我们几个,就问我们坐不坐。他告诉我们对岸就是山西境内。可是我们看到羊皮筏子没边没沿的,又没有抓手。再看看滚滚的黄河水,就直摇头。随后,老汉撑着羊皮筏子载着那位小伙子漂走了,我们又继续徒步往前走。

不知不觉又到了掌灯的时候。我们边走边打听客栈。听老乡说,再走3里路,就有一个小旅店。可这时,天都完全黑了,我们害怕得要命。看见路边有一个铁栅栏门,像是个单位,我们就朝着大门的方向走去。

进大门后,看到右边有个小屋,玻璃上贴着“传达室”三个字,里边坐着一个大爷。王洪敲敲玻璃,大爷抬头看看我们问:“有什么事吗?”王洪说:“想要点水喝。”大爷挺善良的,让我们进去喝水。

我们边喝水,边求大爷帮我们找个住的地方。大爷说:“我真没办法帮你们找到住的地方啊!”我们说:“我们几个女孩要是碰上狼怎么办呀?我们就在您这个小屋坐一晚行不?”老大爷被我们缠得没办法了,就拿起一串钥匙,领着我们去了单位的会议室。他打开会议室的门,对我们说:“你们住这里行不行?”我们一边如捣蒜一样地点头,一边高兴地回应:“行啊,行啊,太谢谢您啦!”

会议室里有几排连椅,我们把它合并成了两张床,然后用挎包当枕头,脱了大衣盖在身上。腿有点冷,就四下寻找看有没有什么可以盖在身上的东西。结果房间里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跑了一天的我们筋疲力尽,很快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我们第二天早上起来后,千恩万谢了老大爷,并且对他说明天下次再走这条路一定来看您,随后就上路了。

这时候,我们依然不知道这里距离韩城还有多远,也不知道铁索桥在何方,只是机械地朝着走着。走了很久,我们看到了商铺和一个食堂,还有小贩在叫卖。还看到一个大大的木牌,上面写着陕西宜川。张京枝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哭起来:“怎么走了两天,还在陕西转呢?”我们赶紧把她拽起来。

我们都走累了,肚子也饿了,就去食堂吃饭。我们每个人要了一碗粉条烩菜和两个馍,又要了些面汤。饭刚端到桌子上,就围上来几个要饭的小孩。看到他们衣衫褴褛,我们就从自己的碗里拨了些菜给他们。

吃饱饭后,我们就去找住的地方。在路上,我们拦住一个老乡问:“哪有旅店?”他说:“从这往前走,然后右拐,有一个大

车店。”谢过人家,我们就继续前行。

走了没一会儿,我们看到一个店铺门口贴着“住宿”两个大字,就去前台问:“住一晚多少钱?”服务员说大通铺每人一晚两毛钱。我们4个人交了8毛钱后,在这里住了一晚。

第二天清晨,我们又踏上了征程。

走了半日,我们终于到了韩城,看到了铁锁吊桥。张京枝和王洪胆大,蹬蹬蹬地就过去了,王玉茹蹭着往前蹭。我看那桥晃人也晃,桥底下是滚滚的黄河水。甬说过桥了,看着头都晕。当我正想像王玉茹那样蹭过去,一个挑担子的老乡把我拽了起来,让我拉着他的衣襟过桥。我死死地拉着他腰间那条蓝色的腰带,不敢往下看,眯着眼睛过了桥。然后给人家鞠了一个九十度的躬,表示感谢。

我们继续往前走了一段路,看到路边竖着一块1米高的大石头,上面刻着两个醒目的大字——运城,便喜不胜收。这时,迎面过来一位老乡,我们拦住他问:“哪有火车站?”他说:“顺着大路直走,有一个侯马火车站。”我们听后喜上眉梢,也不觉得累了,脚底生风,加快了步伐。

我们从晌午走到太阳快落山的时候,才到侯马火车站。这一路颠簸、人困马乏、风餐露宿的困途,终于尘埃落定了。我们进了候车室,放眼望去,三分之二都是知青,就找了一个角落席地而坐,歇了会儿,然后去窗口咨询买火车票的事情。售票员说只有一趟到太原的车。那我们也先买了票,走一段算一段吧。

候车室里有几个挑着担子的小贩,其中有卖粥的,也有卖面条、馄饨的。我们要了四碗馄饨,就着包里揉成渣的玉米馍吃了。填饱肚子后,眼皮就开始打架了,四人互相依偎着睡着了。

忽然,我们被一阵嘈杂声惊醒,才知道到太原的火车要进站了。我们忙起身,跟着人流往进站口走。火车徐徐地停在站台上,往车上一看,车厢里人满满的,车底下还有几十人呢。

当我们正发愁的时候,车门打开了。列车员喊着:“先下后上。”可人们置若罔闻,都挤在车门口,上不去、下不来。

张京枝第一个挤进车厢,把车窗打开了。我们三个人连滚带爬地从人家头顶上爬进了车厢,像刚打了一场仗一样,浑身透湿。到了太原大站,秩序井然,没费劲就登上了到北京直达快车。

回到家里,第一个见到的人是我姐,我撇撇嘴就想哭。我姐眼里也闪着泪花,抱着我说:“怎么弄得像小鬼似的。”随后,我妈和左邻右舍也都围着我嘘寒问暖。

这趟徒步400多里的艰难的回家路,真是刻骨铭心。